

中日现代化比较与探析

□ 许丽莹

[摘要] 从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不同历史命运可以看出,日本的成功在于:它有大批政治精英、武士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政治力量,努力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实施积极的经济政策,批判性吸收儒学,全面摄取外来文化,实行庶民教育,拥有优越的国际环境,得以很快地走上富国强兵之路。而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有其封闭、守旧、集权等近代的落伍性、制度的独特性、社会发展的停滞性等内部原因,也有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等外来因素的干扰,因此步履维艰,最终失败。

[关键词] 中日现代化比较 政治 经济 文化

所谓现代化,是指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过渡的过程,也即人类文明向更高级水平或阶段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不是一种自然和缓慢的演化,而是一种自觉革命(或变革)和建设行为,其特点在于把各种要废止的或摒弃的东西都列入“传统”以作为“现代”的对立面。现代化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基本内涵包括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先进科技,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形态。^[1]

在19世纪中叶“西方的冲击”下,中日两国开始被卷入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中,两国在相似的国际背景下开始在漫长的现代化道路跋涉。起初中日两国作出了一连串相似的举措:先是都坚持“闭关锁国”,其后分别采取“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模式,只学西方的科技而排斥其制度和思想,再后开始探索各自的现代化道路。但几十年后,中日两国却呈现出强烈的反差:日本成功地克服了殖民地化的危机,发展成为独立工业国,走上了建设西方新式工业化强国的道路;而中国丧权辱国,错过了改革图强的时机,陷入了半殖民地化的泥潭,越陷越深。本文将就中日现代化进程中形成反差的因素进行探析与比较。

一、政治因素之比较

第一,两国的政治体制及政权结构不同。中国的权力结构是垂直型的,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落后的满洲贵族和汉族中腐朽的大地主、大官僚阶级联合统治,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极为严密。近代革新力量因为没有地方的强权保护而得不到发展,大大地限制了改革的广泛性、深入性和可能性。日本的权力结构是多元平行型的,政权由天皇、幕府和地方诸侯组成。天皇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实权集中于幕府,地方诸侯隶属于幕府。对于幕府来说,各藩都是经济与政治的独立体,因而有很强的独立性与对抗性。这种地方与中央的微妙关系,使社会变革获得强大的政权取代力量。

第二,两国的革命领导力量不同。慈禧太后作为最高政治权力决策者,没有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任何意识,而领导集团除奕訢、李鸿章等人外,只是一些主张改革的地主阶级开明派,他们的封建性是没有改变的,做的只是对旧体制的修补,并无全面改造封建政治、经济结构,致使早期现代化始终在

“器物层面”上徘徊,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日本有围绕明治天皇掌权的一批武士,他们是从旧体制分化出来的“官员型”政治精英,不仅熟悉国情,而且较早接触西方文化,并实地考察调研了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对西方各国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他们用心地探索比较接近本国国情的有选择性、自主性的“赶超型战略”。

因此,当“西方的冲击”猛烈袭来之时,中日两国的政治统治核心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中国末代皇朝清廷腐朽衰弱,全无改革内在动力;日本的明治政府生气勃勃,锐意改革开放。^[2]面对“西方的冲击”清朝显露了“制度疲劳”症状,统治集团昏庸没落,孤陋寡闻,既缺乏对西方文明的基本了解,也无力“自上而下”地领导一场面向现代化的改革,甚至对国内出现的一切改革苗头都一律予以残酷的镇压和扼杀。而与此相反,当民族危机到来之时,以下级武士阶层为核心的日本改革势力打起“尊王”的旗帜,一举实现倒幕,通过“大政奉还”的形式建立了以学习西方为取向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得以很快地走上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轨迹。

二、经济因素之比较

第一,两国自然经济相异。在西方的势力东渐之前,中国经济基本实现着自给自足,在近代前夕还有大量的茶叶、生丝出口海外,足以用以抵消对西方国家的鸦片和棉织品的进口,在此状况下,经济危机意识较缺乏。^[3]与此不同,日本在西方货品大量输入的情况下,没有同量物品足以抵消其巨额入超,经济的薄弱使其拥有经济的危机感,促使其努力向西方学习,寻求能够用来增加生产的一切科学技术,以推进现代化进程。

第二,两国的土地制度相异。中国是地主制,日本是领主制,前者可以自由买卖,因而具有流动性,后者的财产固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地主制灵活而富有实力,土地所有权的流动可以通过自由买卖实现,这扩大了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因而难以有否定现有经济体制的中间阶层出现,因此阻碍了社会变革。而财产所有国有化的领主制,僵硬而脆弱,领主向下转嫁财政困难,遂在土族内部造成一个怨敌——下级武士,使之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政治力量,推动了现代化进程。

第三,两国的市场统一程度相异。^[4]统一市场是国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国家富强的重要条件。中国

[作者简介] 许丽莹(1988-)女,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本科生。福建厦门 361005。

统一的市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建立起来,统一市场的迟迟不能成立,分散的地方市场成为了买办资本家和地方军阀政权存在的基础,严重阻碍了现代化发展。而日本在江户时代中期已经大体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国内统一市场,以统一市场为基础,产生了强烈要求实现统一国家的倾向,为国家的稳定而努力,大大推动现代化发展。

第四,两国引导经济发展的行为主体及政策相异。在中国,引导经济发展的主体是部分地方官僚,企业的创立往往与地方官僚自身的命运或地方的局部利益紧密联系,这种缺少全国规划的地方行为在市场发育先天不足的情况下是难以创立近代产业体系的。^[4]在日本,中央政府通过制定政策、设立示范工厂,引导新兴工业,创立了全国的产业结构体系。正如洋务运动实行官督商办的方式,“商为承办,官为维持”,使洋务企业的发展严重受到官僚滥用私权的阻碍,官僚们在企业中任人唯亲,严重影响到企业的健康发育成长。而日本的殖产兴业,在适当的时候及时将官营工厂和半官营工厂拍卖出售给民间,殖产兴业政策遂转换为以民营工厂为中心,企业的经营机制改革使企业独立享有经济发展决策权,大大地推动了经济现代化发展。

同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早期中日两国在闭关锁国政策上的具体做法的差异。日本所实行的仅是形式上的闭关锁国,实际上仍积极了解欧洲发展,打听外部世界情况,且仍有贸易往来,因此,为本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之后的经济起飞做好铺垫。^[5]而中国长期处于亚洲册封体系的中心,华夷思想严重,政府长期通过闭关锁国来加强自己的统治,严重限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发展进程。

三、文化要素之比较

第一,中日儒学的差异。儒学的部分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对现代化的发展是起阻碍作用的。因此,在两国社会内部能否产生背离、批判儒学的思潮就成为现代化的启动的重要因素。在传统中国,规定人们精神状态的价值体系还得归结于儒教。韦伯在谈到儒教的本质时指出,儒教包含下面四层含义:一是伦理,二是现实世界的普通人的人伦,三是对现世秩序及习俗的适应,四是为有教养的普通人而准备的行为准则和社会礼仪规则的巨大法典。而其最本质的一点在于把现代社会的秩序局限在血缘社会的内部。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大多数进步的知识分子都试图否定儒教,从西洋引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变革现实社会秩序的教义。儒教最终不能产生从内部变革的传统社会的原动力,这同从儒教中寻求自己统治正统性依据的士大夫阶层不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承担者这一事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德川幕府时代,儒教被定为幕府的官学,但日本的统治阶级并不是文人而是武士阶级,所以,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儒教,在德川时期的日本,变成了教育日本武士处世方法的伦理学。德川家康把儒学定为官学的目的当然是想通过儒学,将幕府等级制度加以合法化。但事实上,日本的儒学没有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幕府末期,儒教走上了现实批判的道路。受儒教影响的下级武士中所以能出现担当起推进明治维新的武士,就是因为这一缘故。

第二,摄取外来文化方式的差异。日本属于全面摄取型,中国属于部分摄取型。日本由于地理位置孤立的自然条件而

产生浓厚的民族危机感,使得日本素有接纳和吸收外来文化的优良传统。对于他们来说,“所谓外国就是长时期内经常给自己带来文化的地方,来自外国的文化往往为自己带来了新的便利和富裕”。^[6]而中国由于长期处在亚洲册封体系的优越位置,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对外来文化则不屑一顾,顽固地排斥西学,拒绝了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途径,也阻碍了汇总过后对西方的认识。此外,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排他性,由于害怕“用夷变夏”,有失国体,所以坚持学习西方时“中体西用”,只在器物层面上接受西学,因此影响了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学习与吸收。

第三,两国的教育形态的差异。日本属于普及、能力提高型,中国属于选拔、达到目的型。日本早在江户时代全国范围内就已经自发地普及了平民教育,儿童就学率很高,庶民教育增加了高质量的劳动力,为生产力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从而为国家、社会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7]而中国的教育普及率极低的问题历来是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后遗症来解释,中国的教育是以科举为中心展开的,只有单纯为了录用考核的呆滞死板的八股文,没有充实的学校教育,不能真正提高国民的素质,缺乏社会改革的驱动力,大大阻碍了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

四、国际环境之比较

首先,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发生在工业革命、世界走向一体化的时代,国际环境成为制约其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面临的民族危机表面上类似,实质上具有很大差异,当时,从印度洋东渡而来的西方列强更为垂涎的瓜分对象是中国,而不是作为西方国家“东方航线”终点的日本。19世纪中叶,日本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面临着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机。但此时西方各列强均处于对东方侵略的一个相对和平的间歇期,都由于自身问题的困扰而无暇顾及日本的事务,日本就暂时赢得了宽松和平的国际环境。^[8]而中国始终处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缺乏资产阶级获得政权的根本性前提,不可能完成近代化的任务。尽管中国也进行了“变法自强”的戊戌变法,但那时西方各列强已摆脱了自身问题的困扰,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正开始大肆侵略亚非拉。由于日本只是边缘小国,资源贫乏,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都不大,而中国地大物博,因此,瓜分中国和武力干涉愈演愈烈,中国维新派所遇到的阻力更大了。^[9]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为日本及东亚各国吸引了西方侵略的主要注意力,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提供了屏障。

其次,当时亚洲正处于第二次民族运动的高潮。亚洲人民的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西方殖民列强的侵略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日本所受的外部压力,牵制了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侵略。然而,日本却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疯狂地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大肆侵略中国、朝鲜及其他亚洲国家,其国力的急速上升是以打断和牺牲东亚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为代价的,整个东亚的资源、市场、人力和物力支撑了日本的发展。^[10]通过对邻国的侵略,日本的资本原始积累真正充分展开,工业革命迅速完成,加速了日本现代化的步伐。可以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一直走的是通过海外扩张迈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也是以牺牲东亚其余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为代价换取的。

(下转第109页)

自2005年的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截止到2010年5月人民币累计升值已超过17%。今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发表声明敦促人民币升值,随后关于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人民币很可能会升值。人民币升值后,如果国内外商品的绝对价格不变,本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将比以前要贵,这会减少我国出口商品的低价优势,从而降低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

二、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1. 促进进出口结构的升级,优化加工贸易,向高技术产业转型

在充分利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的同时,着手在高技术领域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对于高新技术和机电产品的出口给予优惠的支持,逐步减少初级产品和高耗能产品的出口;在进口方面,积极推进国内短缺的能源、矿产资源、原材料的进口,着力吸引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逐步从代加工向代设计和自创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方向发展;引导加工贸易企业更多地采用国产料件,延伸产业链条,加强对各个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

2. 要高度重视进口增长方式的转变,发挥进口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完善进口税收政策,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和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进口,缩短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以进口带动出口,进而实现赶超。同时,我国应该充分发挥进口大国优势,积极融入全球资源定价体系,逐步掌握资源进口的主导权。

3. 扩大内需,减少对贸易的依赖程度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市场规模巨大。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但是这些收入大部分以储蓄的形式停留在银行,国内消费明显不足,扩大我国内需的潜力非常的大。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通过扩大内需带动经济的发展,减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为此,国家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努力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配合运用税收、价格等经济杠杆,全力解决有效内需不足的矛盾。

4. 加速市场多元化步伐,及时调整贸易流向

企业要大力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在巩固欧盟、美国、日本、香港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着力开拓南美、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东欧、俄罗斯等新兴出口市场,防范单一市场的不稳

(上接第83页)

从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不同历史命运可以看出,日本的成功在于它有大批政治精英,有武士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政治力量,拥有紧迫的经济危机感,努力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统一的国内市场,积极了解欧洲发展,实施积极的经济政策,批判地吸收儒学,全面摄取外来文化,实行庶民教育,拥有优越的国际环境,得以很快地走上富国强兵之路。而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有其封闭、守旧、集权等近代的落伍性、制度的独特性、社会发展的停滞性等内部原因,也有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等外来因素的干扰,因此步履维艰,最终失败。

[参考文献]

[1]金熙德.中日现代化的殊途与交错[J].日本学刊,2001,(5).

定风险。汇率的变动确实会影响对外贸易,但此处所说的汇率指的是有效汇率(A币的有效汇率= $\sum A$ 国货币对*i*国货币的汇率指数(以基期为100) $\times A$ 国对*i*国贸易额/ A 国全部贸易额)通过贸易的多元化,改变我国对各国的贸易比重结构,以便使本国货币对某一种货币升值的同时,实际有效汇率保持贬值,减少汇率变动对本国贸易余额的不利影响。

5. 加强国际协调

国际贸易是发生在两个以上国家之间的交易,减少贸易摩擦需要各国达成共识。首先,我国应该积极开展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在世贸组织规则、法律框架之内,与各国进行磋商与沟通,保证对各国的公平。其次,在必要时候,我国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威慑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力,迫使他们谨慎行事,减少日后的贸易摩擦。

6. 加强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扩大自由贸易区内贸易

我国可加快中国-东盟、“东盟+中国”(即“10+1”)和“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即“10+3”)等区域合作的步伐,加大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程度,减少贸易摩擦。

7. 外贸企业要高度重视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加强跟踪研究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

研究和适应人民币浮动汇率机制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长期任务,企业要把应对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作为经营管理的一项关键举措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尤其是要关注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币种的汇价变动情况,深入研究人民币升值对本企业出口的影响程度,努力增强应对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 [1]刘可.我国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006,(3).
- [2]朱嫣.人民币升值下我国对外贸易的政策及建议[J].商场现代化,2009,(2).
- [3]王勇.辩证对待中美贸易摩擦和施压人民币升值问题[J].国际贸易,2010,(4).
- [4]张莉.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关系的格局及趋势[J].国际贸易,2010,(5).
- [5]周文凤.国外对华反倾销与我国的应对机制研究[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8.

(实习编辑:王玉琼)

[2]孙津.打开视域——比较现代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富永健.韦伯与中日现代化比较[J].思想,1988,(5).

[4]张经纬.中日两国现代化变动特征的比较[J].世界历史,2003,(3).

[5]王符.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日两国现代化道路之比较[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

[6]杨凤.后发式与政府领导型——中日比较视野中的一种现代化模式探讨[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3).

[7]兰世惠,吴红.中日早期现代化比较[J].前言,2005,(5).

[8]项贤明.比较教育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07,(12).

[9]杜芳明.中日现代化进程比较——中日经济现代化阶段比较[J].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8,(22).

(实习编辑:王玉琼)